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M

名家推荐丛书

MINGJIATUIJIAN

程德培 主编

名家推荐 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散文随笔

23位名家推荐

巴金 余光中 北岛 龙应台 韩少功

洁泯 汪丁丁 陈思和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名家推荐 2003年最具阅读价值 散文随笔

23位名家推荐

巴金 余光中 北岛 龙应台 韩少功

洁泯 汪丁丁 陈思和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推荐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 / 程德培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340-3

I. 名... II. 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932 号

名家推荐 2003 年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

主 编: 程德培

特约编辑: 朱小如

责任编辑: 余 同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81-340-3/I·046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的话

◎编者

可以说,没有众多名家的积极参与,这套与众不同的年度选本是不可能诞生的。

在此,我们向下列各位推荐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推荐作家、评论家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东	王宏图	邓一光	古 耜	叶兆言
白 烨	朱小如	刘醒龙	关仁山	毕飞宇
红 柯	孙甘露	李子云	李敬泽	杨 扬
吴 玄	吴义勤	吴其尧	何 锐	宋炳辉
迟子建	张 生	张廷佐	张 闳	张 炜
张 柠	张 陵	张颐武	张燕玲	陈 村
陈世旭	陈思和	林建法	周 涛	宗仁发
荆 歌	郜元宝	洪治纲	洪清波	贾平凹
贾梦玮	谈瀛洲	盛子潮	韩石山	蒋丽萍
程永新	谢有顺	熊学亮	潘凯雄	穆 涛

◎编者
写在前面的话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目录

CONTENTS

按推荐日期先后排列

001 编者 = 文 写在前面的话

001	巴金 = 文	怀念振铎	陈思和推荐
008	陈思和 = 文	巴金和他的《怀念振铎》	陈思和推荐
014	北岛 = 文	他乡的天空	程永新推荐
048	韩少功 = 文	山里少年	林建法推荐
052	朱苏进 = 文	看那个雄性勃发的王朝	吴义勤推荐
062	龙应台 = 文	当权力在手	荆歌推荐
069	李晓君 = 文	一个人和他的城市	陈世旭推荐
076	詹克明 = 文	保护“诺亚方舟”	古 昶推荐
086	周晓枫 = 文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李敬泽推荐
100	李国文 = 文	小说的粥化	白 烨推荐
106	于 坚 = 文	癸未三峡记	谢有顺 宗仁发推荐
165	孙甘露 = 文	上海流水	陈 村推荐
173	洁 泯 = 文	随笔三则	李子云推荐

- 178 迟子建 = 文 骂声中的浪漫洪清波推荐
- 181 方 方 = 文 消失的游戏王宏图推荐
- 192 黄集伟 = 文 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朱小如推荐
- 204 王彬彬 = 文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贾梦玮推荐
- 225 李江树 = 文 中原厚土迟子建推荐
- 246 刘长春 = 文 难忘地带宗仁发推荐
- 259 张燕玲 = 文 此岸·彼岸洪治纲推荐
- 267 余光中 = 文 另一段城南旧事郝元宝推荐
- 272 梁 衡 = 文 乱世中的美神程德培推荐
- 286 孙 郁 = 文 苦雨斋旧事潘凯雄推荐
- 315 汪丁丁 = 文 杭州,最后的印象孙甘露推荐

●陈思和推荐

怀念振铎

◎巴 金 / 文

—

1958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

◎巴
金
怀
念
振
铎

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禹,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禹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禹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二

40年过去了。

40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

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1958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1922—1923），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作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 1936 年 10 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最要紧的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五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一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作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 17 年中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

◎巴金
怀念振铎

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六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

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

.....

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修改、续写。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1月21日)

●陈思和推荐

巴金和他的《怀念振铎》

◎陈思和 / 文

巴金先生的这篇四千多字的散文《怀念振铎》，是一篇未完稿。据李小林女士的回忆，这篇文章起笔于1989年春，当时他完成“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不久，经过小憩后，写了人物回忆《怀念从文》，文情并茂，流传及远。巴金先生计划继续写作一组类似的散文，回忆亲朋故友，第二篇就准备写《怀念振铎》。但不久社会风波动荡，他写了两千多字，再无心写下去，稿子被搁置一边。1990年代初的几年里，巴金先生体衰多病，又忙于编校创作全集和译文全集两个系列，无暇顾及续写。但完成这篇文稿一直是他的心愿，曾经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起。1998年初他与小林合作，用口述的方法完成《怀念曹禺》一文后，对口述写作颇有信心。是年年底，他过完生日，自感身体越来越虚弱，便主动提出要修改和续写《怀念振铎》，还是与小林合作，一段一段修改旧稿，一句一句口述新篇，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有时一次仅能完成几句话的修订。可以想见，当时巴金先生为完成这篇文章耗费了巨大的生

命能量。小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999年春节前的一个周五,他修改了一段后觉得疲倦,就停下来了。几天以后,因为病情危重导致呼吸衰竭,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从此无法再进入正常的工作状况。所以也可以说,巴金先生用笔、用声音工作到他力所能及的最后一刻。《怀念振铎》虽然还没有写完,却是巴金先生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的一篇文章。

如果不是小林告诉我,老人本来还准备在文章里写入很多内容,我读这篇文章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一篇未完稿。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最后一句关于记忆奔逃的描写,我觉得是老人对于自己在病中挣扎着思想和写作的最逼真也是最精确的感受。一个人努力思想,可是记忆(也可以理解作正常的大脑思维活动)却像不属于他似的,像是骑着骏马在逃离他,而他也抓不住记忆,感到自己将留在一片思维模糊的黑暗里。这就是这位一生向读者敞开心扉、写了一千五百多万字来倾吐感情的伟大作家的最后一行字。

从《怀念从文》开始,巴金先生曾计划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坛旧事,清理自己与朋友间的各种是非纠纷,他的思路也逐渐从反思“文革”进入对漫长的文学史的细节的梳理。郑振铎先生是巴金的前辈、挚友,在巴金的文学生涯中有过提携、帮助之恩,但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也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诉诸文字上的攻击。但这只是朋友间(用当时的话说是属于“同一阵营”里战友之间的误会)的矛盾与冲突,无伤大雅。抗战以后两人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早逝于1958年,巴金曾写过悼念文章,但没有涉及以前的冲突,我想郑振铎先生生前一定没有正面回应过巴金等青年作家对他的批评,而是用事实来证明他收集保护旧版古书

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巴金先生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振铎解释他们之间的误会，所以耿耿于心怀，期期于言辞。在《怀念振铎》里巴金先生愿意把历史上的误会讲述清楚，并对着振铎的亡灵，说出自己对朋友的忏悔，也尽力地刻画出他心中真实的友人的形象。

巴金先生要诉说的，不是文学史上大是大非的事件，而是朋友间的误会与隔膜而造成的纠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的队伍组成主要是由两种人：一种是流浪型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岗位型的知识分子。前者往往居无定所，以笔为生，聚集在现代都市里，厕身于社会底层，吸收各类流行信息与观念，观察各种社会阴暗与罪恶，他们才气横溢又备受压抑，思想激进又意气用事，他们的创作里喷发出一股巨大的怨恨力量，冲击着平庸社会的常识常态；而后者，因为有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比较务实，他们对现实也充满清醒的批判意识，但不是偏激的怨天尤人，而是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在平凡工作中一步一步积累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像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胡风、丁玲以及大大小小的左翼作家差不多都属于前者；而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老舍等属于后者。两者之间有亲密合作的可能与实践，但是也经常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后者因为有一比较稳定的生活保障，容易获得社会信誉度，常常出头露面，荣誉多于前者；前者敏锐而激进，往往使他们的事业追求有好的开端却无善的终结，不免陷于失败。不平等造成迁怒与浮躁，再加文人之间的傲气自矜，两者缺乏沟通和坦然交流之心，误解与攻击成为不可避免。巴金与郑振铎的矛盾大致属于这类。

不说也罢，说起来真是很小：1930 年代，郑振铎在北平挂名《文学季刊》编辑，团结了一批京派的文人，具有学院派的味道；而刊物的实际编辑章靳以则与巴金联手，本着自己的理想与激进的态度编刊物，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在工作中产生的。比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就是靳以交给郑振铎，振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靳以又把它交到巴金手里，通过巴金的推荐使它得见天日。这便是一例。其他还有巴金抽掉了季羨林的稿、又与李长之发生争论等等，而季、李都是郑振铎的学生，矛盾难免涉及振铎先生。朱自清先生当年的日记里

记载了这些冲突,均云“振铎见告”,靳、巴等“擅于”刊物如何如何,可见振铎是站在季、李一边。也不能否认郑振铎希望把刊物朝学院派靠拢的方针与巴金靳以的重社会批判的办刊方针是不一样的。这些矛盾最后导致刊物停刊,理由据说是认为“读者不需要”。巴金靳以迁怒于振铎是可以想见的。在《文学季刊》停刊的终刊号上,巴金写了一篇《告别的话》,不点名地批评郑振铎热衷于收集古书版本的行为:“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这话今天读起来会令人感到偏激而不舒服,所以巴金在《怀念振铎》里说,他“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但是撇开对振铎本人的误解不谈,如果就事论事的话,我觉得,商人利益如何操纵文学,迫使严肃的文学如何以“读者不需要”的理由受到排斥,以致日益边缘化的严重性,在今天的状况恐怕比巴金当年说出这段话的时候要严重得多,巴金先生这些偏激的话放在今天读来一点也不过时,只是我们不敢面对这现实而已。

但是这段话当初也没有被刊登出来,等《文学季刊》印出来时,巴金发现文章里这段话被删去了,他一直认为是郑振铎擅自删去的,以后他又接连发表了几篇杂文和短文,一再提到这件事。但郑振铎似乎一直没有正面解答这件事,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郑振铎不是一个喜欢惹是非的人,他忙于教书、著述、出版、收集古籍版本,以及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是个真正志向远大、宽容大度的人,虽然他也许有些缺点,但在知识分子坚持民间岗位实践自己的神圣使命和理想方面,不愧为后人的榜样。他在北平的文人圈子里似乎关系不好,最终离开了北平而南下,但上海的左翼青年作家对他的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行为也带了很深的偏见,所以他一时弄得左右都不是。在那时,郑振铎顾不得《文学季刊》的风波,他正在集中精力编辑出版《世界文库》,力图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交流建筑起一个敞广的